

一九九三年度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黔西南州在我省对东南亚 开放中的地位 and 作用

《黔西南州在我省对东南亚开放中的地位 and 作用》课题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

课题组成员名单

课题组负责人：鲍吉锐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
黔西南州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课题组成员：潘正才 中共黔西南州委宣传部副部长
黔西南州社科联党组书记
孟祥熙 黔西南州政府办业务一科科长
夏开益 黔西南州政府办业务二科科长
刘佐军 黔西南州政府办副主任科员

目 录

- 一、黔西南历史上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2)
- 二、黔西南州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面临的发展机遇…… (13)
- 三、黔西南州在贵州省对东南亚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21)
- 四、黔西南州对东南亚开放的战略构想…… (30)
- 五、黔西南州在贵州省对东南亚开放中的政策建议…… (33)
- 附：评审委员会人员名单及评审意见…… (39)

黔西南州在我省对东南亚 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九九二年春，以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新浪潮涌向贵州高原，给贵州省人民增添了无限的力量和希望。抓住时机，解放思想，冲出贵州，走向东南亚，走向亚太，走向世界，开创贵州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已经成为贵州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九九三年，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提出了“南下、北上、西进、东联”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我们认为，贵州扩大对外开放，首先就要扩大对东南亚的开放。这并非是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由贵州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以及当前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决定的。贵州要对东南亚开放，黔西南州则是一条最佳的重要通道和前沿阵地。本课题拟从黔西南历史上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作用入手，重点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黔西南州在贵州省对东南亚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黔西南历史上在南方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and 作用

(一)黔西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具有悠久的文明发展史

黔西南自治州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1975年11月 and 1985年4月，贵州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先后在自治州首府兴义市顶效镇猫猫洞、丰都乡张口洞古文化遗址发掘出古人类化石和其他文物。据考证，在距今1.2万年以前，旧石器晚期，“兴义人”就繁衍生息在这片沃土上。那时的“兴义人”虽穴居野处，但已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群居生活。南北盘江流域 and 黄河中下游一样，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

据史料记载，今黔西南自治州境内在上古史时期属盘瓠国地，殷代为荆州西南裔，周朝初期属越地，春秋时期为牂牁国，战国、秦汉初属夜郎国，唐朝时期属西平州，宋代属自杞国及罗甸国。元代分别属于云南行省曲靖宣慰司的普定路、普安路 and 湖广行省八番顺元宣慰司的泗城州。明代分别属于贵州安顺军民府的普安卫、安南卫 and 广西布

政司的泗城州安隆长官司。清代，属于贵州行省南笼厅、南笼府，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改南笼府为兴义府，府治安龙。

黔西南地区古称“盘江八属”。古代的盘江八属系指南盘江和北盘江环抱的盘县、普安、晴隆、兴义、兴仁、贞丰、安龙、册亨八县。1971年盘县划归六盘水市，设置盘县特区。兴义县1988年改设兴义市。现今的黔西南自治州含望谟县在内仍为八县市。

古朴文明的布依族、苗族是黔西南州的自治民族。布依族人民以水田农业为主，大多座落在河谷、溪流、盆坎和较平缓的丘陵地带，其他各民族多与布依族相邻为伴，共同生活与发展。在这片土地上，布依等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既有自种的谷物、自养的鱼虾为餐桌提供美味佳肴，又有棉麻和蚕丝提供衣着原料，还有村寨附近丰富的竹木可供建房修屋和制作各种农具、家具，因此，人们的生活大多不必依赖外部世界。南、北盘江流域这样的特殊条件自然环境，使它形成了一个大体可以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故古人曾在此建立“夜郎国”。

黔西南自治州是一个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地区。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州内居住着布依、苗、彝、

回等3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1%。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戏剧等文化艺术蕴藏丰富。几百多年前诞生的民族戏剧—布依戏，是步入全国民族戏剧的戏种之一；绚丽多彩的布依族、苗族民间音乐和舞蹈，是祖国民族文化中的一块瑰宝。这些凝聚着各民族先民的智慧和创造的灿烂的文化遗产，解放后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经过发掘、加工提高，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更加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彩。

（二）黔西南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和东南亚已经沟通了经贸往来

据史书记载，西汉初年，黔西南地区与巴蜀、中原等地已发生了商品交换关系。汉人商贾从西南夷运出笮马、髦牛和奴隶。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运入西南夷，有的还经由夜郎浮牂牁江转贩到南越（参见《中国史纲要》第1册，第144页）。黔西南自治州兴义市万屯镇、兴仁县交乐乡的汉墓群出土的“巨王印”、“铜车马”、“水塘稻田模型”等文物表明，汉代黔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了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汉代的农耕技术和制车术早已传入黔西南。

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南越食蒙蜀枸酱，蒙

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偶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史记》第九卷，第2994页）。可见，黔西南地区在古代就与中原、巴蜀及广东沿海地区有着经济交往关系。

黔西南自治州，由于地处滇黔桂三省区接合部，州府所在地兴义为三省通衢，又有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某些贸易市场沟通毗邻地区，“郡境场市皆有定期。期至，百货云集。”（《兴义府志》第十，市场）。因而吸引着外地经商的客户。随着汉族移民的迁入和迅速增加，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使交通沿线、自然条件较好的坝子地区和丘陵地区的农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种桑养蚕抽丝织锦也相继发展。桑树“种之于山，则可以饲蚕作茧，衣食万民”、“丝帛之利数十倍于‘薪炭’”，种桑养蚕，“惟安顺、兴义、黎平三府及贵阳府之定番州（今惠水县）间或有之”（《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228页）。

从历史上来看，贵州丝绸业发展，兴起于遵义府（公元1793年），以后陆续扩展至黔西南的兴义、兴仁等地。黔西南地区是贵州省丝绸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兴义、普安、贞丰种植棉花有所发展（《兴义府志》

第43卷,第21页),棉纺织业,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公元1796年到1850年)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兴仁、兴义有不少四川、湖北等省的灾民流入,他们“无地可耕”,因有纺织手艺,唯有“尽力纺织”,从而促进了兴仁、兴义纺织业的兴起。当时,只有千余户的兴仁县城,仅弹花弓就有500多张。由于纺织业的发展,兴起了办染房(由最初的五家,极盛时发展到近百家),继而带动了兰靛种植:市场亦为断发展,贩销队伍不断扩大,土特产品销售量不断增加,大商号相继出现,饮食店和客马店亦纷纷涌现。

许多商人还将四川、贵州和黔西南地区的土特产品,经广西、广东、云南运销到越南、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并带回当地的特产到黔西南地区销售,从而建立了较密切的经贸交往关系。据史书记载,西汉初年,巴蜀的铁器和其它商品进入西南夷,有的还经由夜郎浮牂牁江贩运到南越。西汉建元末年,番禺唐蒙在南越发现了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通达南越,因此,唐蒙向汉武帝提出发夜郎兵浮牂牁江抄袭南越的建议。《汉书》写道:“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清代《兴义府志》称:安龙“远通羊城(今广州),迈达象郡(今越南),贾商辐辏,华物骈臻”。清代康熙年间,顾祖禹著《北盘

江考》记载：汉武帝时，唐蒙欲浮船牂牁江以制南越，武帝使驰义侯发夜郎兵，下牂牁江，会番禺（今广州）。到民国初年，贸易更加扩大，据《兴仁县志》记载“民国1—10年（1912年至1921年），县人马成良的‘文和昌号’，近则在江浙港澳购销，远则往来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经商。两湖、两广商人收棉纱、布匹、食盐、煤油和部分生活用品运到县内销售”。可见，黔西南与中原地区和东南亚商贸往来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开始，到了民国则呈进一步发展趋势。

（三）黔西南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一条重要通道和一个商贸枢纽。

丝绸之路分为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是指：（1）由中国南部直接取道海上西航，此即古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2）由成都出发，经宜宾、泸州、昭通、昆明、楚雄、腾冲经滇缅通道至印度，此乃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路。除上述主要路线外，其支线纵横交错，黔西南地区就是其中一条重要支线的必经之地，并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1、黔西南地区的南盘江、北盘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水上要津，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曾作出过重要贡

献。据《贞丰县志》记载：贞丰县的“白层渡，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知府冯廉改为官渡，……白层渡口早已成为贞丰通往广西、广东的水上要津，航运历史悠久。商务盛时，帆樯林立，过客昼夜不绝”。历史上南、北盘江航运业务的繁盛景象，由此可见一斑。民国28年（公元1939年）6月，贵州省政府调查南、北盘江和红水河水系航运情况，并在调查报告中记载：北盘江在关岭、贞丰境内长约一百一十里，有载重二千余斤的木船14艘。南盘江在册亨县境内自路雄至双江口90公里内有2-5吨船约40只。当年《贵州红水河航运概况》亦记载道：贵州省水电勘测设计院技术档案L21-1-9查红水河自广西之迁江以下，滩少水宏，可航电船，以上则通帆船。红水河上自南、北盘江相汇合之蔗香起，下迄广西之迁江止，长五百余公里。在民国十九年前，黔西南各县之桐油及特货，恒有自贞丰所属之白层港装运下驶，直航至苍梧或港粤等处。上水船则大都以装载棉纱、布疋、食盐、瓷器为大宗；每年货运往来之舟楫约达数十艘（参见《黔西南自治州志·交通志》第151页）。

可见，南、北盘江自古以来就是黔西南人民行船运输的黄金水道，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水上要津。它以

博大的胸怀，载舟履船，为沟通祖国中原地区、西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东南亚国家乃至中亚和西亚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黔西南地区的古驿道，是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黔西南古驿道的形成，源远流长。据考古资料证明，汉代时期，黔西南地区就已形成古道与中原地区相通，并且有了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总兵吴复自关索岭开箐道，取道普安、安南、贞丰渡红水河入广西；明朝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开始置黔滇驿道，过盘江渡，经保甸、哈马、尾酒（今晴隆县凉水营）、普安、盘县入滇境，沿途设卫、所，兵丁担负劳役。清朝雍正元年（公元1728年），改道经西陵渡、阿都田、半坡塘、崧崧山，过盘县入滇境。以后，废卫、所，设塘、汛，雇长夫于里甲，以夫、马担负官办驿道运输（参见《黔西南州交通志》第1页）。随着官办驿道的拓展，有了官办通省城的驿道，不仅有利于官府的交通往来，而且也为民间运输提供了便利。

古代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或成都，经宜宾、泸州，然后或经昭通、沾益、曲靖、昆明到滕冲或入印度

出西亚或沿滇缅通道出西亚；或经遵义、毕节、安顺、黔西南、文山进入越南老街、河江、河内，出南亚和西亚。而湖南、贵州的物资，则经贵阳、安顺到黔西南，然后分别西运或南运入滇缅或印支出西亚，或入广西、越南，抵达东南亚和中西亚。

黔西南地区为了加强与外界的交通来往，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黔西南人民先后在南、北盘江及其一些支流上架起了终年通行无阻的人工铁索桥。著名的有晴隆与关岭连接的盘江铁索桥，有贞丰与关岭相连的花江铁索桥，还有兴义与罗平相通的岔江铁索桥等。这些铁索桥，自古以来就是沟通滇黔两省的重要通道。

3、黔西南地区的兴义、兴仁等城镇，是古代滇黔桂边区商品交换的重要集散地，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东南亚一些国家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近邻，是最早与中国发展贸易往来的地区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同东南亚的海路贸易就已经开始了。在隋唐宋元期间，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就逐渐繁荣兴盛起来。从15世纪初开始，郑和七下西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使双方的贸易在规模、范围、程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郑和的船队通过 赐贸易，在

东南亚打开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使这一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因此，明代成为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黄金时期。

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交往中，黔西南地区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早在明清时期，兴义、兴仁两城镇就是滇黔桂边区商品交换的重要集散地，又是贵州西南的商品重要集散地。清代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兴义设县府于黄草坝后，棉纺织业逐渐在城乡兴起，清代道光年间，兴义已成为新兴的棉纺织城镇，并且成为贵州省的一个棉纺织市场和滇黔桂边区纺织产品的重要集散地。特别是靠近兴义的“通商滇民之以花（棉花）易布者源源而来”（《黔南职方记略》第二卷，第6页）。

由于黔西南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的结合部，在古代历史上驿路交通较之其他地方便利，加之资源丰富，大量外地移民迁徙入境，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手工技艺及开采矿业的先进技术，从而刺激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封建社会晚期，兴仁、兴义等县的织布业，晴隆等县的民营矿业处于贵州省的较领先的地位。所以，当时兴义、兴仁便成了贵州由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的商人贩运洋纱

洋布的集散地之一。据史料记载，兴义在清代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英国纱已开始输入，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前后，织布的经纬纱逐步大量使用洋纱。据1896年-1897年英国布莱克商会访华团报告说：“黄草坝主要因为每年输入的大量印度纱及该镇邻近地方用印度纱织出的布而闻名。据估计，每年在该地销售棉纱1000包，每包重400磅，共计40万磅，各种织布机约在二千至三千台之间。大部分绵纱由该镇开设的广东商行代理去香港购买，经由北海、南宁输入，运至两江的百色厅，改交驮运；黄草坝进口的洋布极少，……每年不超过一千五百疋”（《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49-250页）。

历史上，兴义的外贸业务出口有桐油、鸦片、中药材等，陆路运输靠马帮，由兴义运抵云南河口和越南老街；水路靠船只，由贞丰、安龙运至广西、广东出口岸，销香港和东南亚，用以换回兴义境内短缺的煤油、绵纱、绵布、西药等日用品。出口物资中，红桔（又称大红袍）质量特优，多次获得外商的好评，年出口量达30~250吨，主销香港；干姜质量高、香味好，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好评，年出口量达80~150吨；猪鬃出口量最高年份达到3万公斤（摘自《兴义县志》第382-383页）。

综上所述，黔西南地区的南、北盘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水上要津，黔西南地区的古驿道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黔西南地区的兴义、兴仁等城镇是古代滇黔桂边区商品交换的重要集散地，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黔西南州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面临的发展机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三次中央委员会以来，执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一个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搞活经济，促进发展的态势逐步形成。在中央关于扶持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黔西南州既面临着时代进步的挑战，又迎来了加快发展若干历史机遇。

(一)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亚太经济圈的形成，将给黔西南提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机遇

当前，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地区经济集团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朗。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加快进行，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国际、国内大市场的竞争日趋剧

烈。然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亚太地区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重点发展的地区之一，将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经济后进地区。近年来，在亚洲地区出现了三角经济区现象，而我国西南沿边与东南诸国形成的三角经济区，是目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三角经济区之一。三角经济区的形成，给黔西南经济走向东南亚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大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发展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前景十分广阔，一个包括西南地区、中南半岛在内的新的经济圈将逐步形成，为黔西南州乃至我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二)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倾斜政策的调整，为处于西部地区的黔西南州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1、党中央一直把缩小沿海和中西部地区差距作为重大问题予以关注，把扶贫措施延续到本世纪末，设立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并提出了“八七”扶贫会议攻坚计划，这对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黔西南州这样一个少、边、山、穷地区的发展极为有利。

2、中央加强宏观调控，重点是加强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这一倾斜政策，保证了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农业的投资需求，这对于黔西南州当前大